



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



徐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辩证

上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继考古史辨派“疑古”精神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新、旧资料,试图重建中国上古的历史。对于史实的重新认识,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补古史辨派的若干不足,需要加以重新解释和弥补。而古史辨派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伪造的古史系统”命题,也需要加以重新审视和解释。

从现象而言,古史辨派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正确的,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否皆是伪造,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不可否认,“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当中有许多非信史的成分,但整体而言,并非皆是伪造所致,而是史学发展的一种合理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用于比较研究的古史原本是一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这个非完整的古史系统一直处于完善之中;二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导致古史系统的日益完善。

(一) 原本非完整的古史的重建

由于目前能完整体现古史系统的文献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典籍,所以严格上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史系统,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古史系统。而关于古史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也大多是以这一时期的这个古史系统为原本进行的。

总观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先秦典籍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本特色,如《尚书》、《诗经》、《春秋》等典籍都是以前人的历史为主要记述对象,以人类社会的活动和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少有神话性的记录,极少对自然现象、神灵等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的解释与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关于人类社会与制度的解释,而且

必须有关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解释,而这些在先秦典籍中却十分缺乏。但从《山海经》等书籍看,当时解答自然现象、记录神话的书籍当也不在少数,只是由于后世取舍,导致这类书籍亡佚,被人遗忘而已。即在先秦时期即有相当一部分记录神话和传说时代的书籍被清理出“经典”和“信史”之外,早期的传说与神话没有能够整合进入主流的古史系统,而被散落在外。

从世界范围的早期历史看,人类的最初历史是从神话开始的,几乎所有文明的前期历史都充斥着神话和传说,中国历史却是明确地以人为主。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古史系统在形成的初期即抛弃了神话与传说,而关注人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自建立古史的时候起,就已经把上古史中的神话时期忽略了——最初的史学系统已经缺少了最早期的历史。

然而,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在逻辑上、完整性、系统性还是研究需要上实际都是无法被省略掉的。所以,这部分被省略掉的历史一直处于重建之中——“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逐渐被建设起来。

春秋的人本主义是有其根源的。周人灭商,是以“小邦周”代“大邑商”,统治并不稳固。所以非常关注其统治合理性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德”与“天命”相联系,使个人行为与品质成为获取“天命”的依据,强调人在宗教中的作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现实中则提倡“尊尊、亲亲”等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思想。西周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学在王官”,“王官”执掌各自有所侧重。人本思想的指导加上“学在王官”的单一整理形式,导致文化内容的纯洁,突出了人事在古史系统中的地位,各种不符合人事常规的神话虽然存在,却无法被整合到同一系统当中。

春秋时期,学者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本思想,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形势也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人事。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兼并,大量小国被吞并,小国原有的贵族沦为下层平民,将学术带入到民间,私

学兴起,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央无力控制学术,而在兼并中角力的各国则急需找到强国存宗的资源,希望能从学术中有所收益,学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相对独立地位。而各家流派的主旨也基本相同,一是努力恢复原有的高贵地位,二是试图取得诸侯支持,以有用武之地。前者使学说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力图保持原有的面貌;而后者使各派为了保持说服力与可信度,以求用于诸侯,都尽力不涉及较虚无的上古资料,而使用较为人信服的近世的资料。所以,春秋时期虽然私学兴起,各家有了将各种杂学掺进本派学术的空间。但是,却没有出现上古史的重建热潮,上古史反而因为要为当时的时势服务而被忽略。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时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初的古史系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流传后世的经典进行整理的儒家更为注重人事,“怪、力、乱、神”几乎被摒弃在经籍之外,神话和传说时期的古史也未能进入古史系统当中。儒家的整理使得杂说更加难以进入系统,使我们视野中的上古史十分单纯,从而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埋下了伏笔。

中国上古史系统增益,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二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三是唐宋明时期。

战国时期,进入“争于力气”的时代,主要大国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一方面“政在诸侯”的合理性解释已经不是必须,另一方面存亡的现实迫使人们更关注实用,学说向实用性转化。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学说被冷漠,各派学者通过学术获得承认和地位的机率大大降低,专注服务于政权的热情也随之减弱,各种个性化的非主流的内容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而各国也忙于争战,无暇顾及学术的统一。所以,这一时期有大量被散落的古代神话和传说被纳入到学派的研究当中,上古历史比春秋时期更加丰盈。

春秋诸子百家兴起,学说兴盛,但由于战乱和分裂,一直未能有全面的整合。秦统一中国,本有综合整理的条件,但秦朝“以吏为师”,又焚书禁儒,文化反而退步。西汉处于一个文化转折期,西汉既继承了秦的统一国家,又抛弃了严苛的“尚法”制度,为古代文化全面整理奠定了基础。西汉促进上古史重建的重要事件有汉初的献书令、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及文学的兴起,这些事件使一部分资料复现。但由于独尊儒术,所以主体依然以儒家六经为主,增益的材料不多。而东汉则由于谶纬之学兴起以及新朝的王莽复古等原因,大量古史材料出现,其中有很多伪造的成

分,但也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已有古书的辑录。

三国至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原有的儒学系统满足不了社会的现实和精神需要,导致这一时期宗教的飞跃与发展,道教、佛教先后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与儒学的争执与融合中前进。各派为了寻找合理性依据,都从中国上古史中寻求支持,许多古史资料得以辑录。

唐朝与汉代有相似性,都是长期动乱之后的兴盛王朝,都对文化进行了综合与整理。唐代是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上古史重建的重要时期,对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的思潮进行了统一与整合。宋人主张直接读经,并开始出现辩伪的倾向,上古史增益本不容易。但宋、明以后的上古史依然有所增,这主要得益于宋以后教育的普及、类书的编纂和私刻书籍的兴盛,这些都使许多散落的材料得以著录成书。而这一切与科举制度兴起、印刷术盛行等社会现象有关。

综合分析上古史的增益过程我们会发现上古史增益的三个特点:一、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整合相伴随。每一次增益、几乎都是首先出于社会和思想的动荡导致大量非主流思想和资料进入典籍,然后是稳定时期对前一阶段的整合与定型,使得上古史越来越丰富;二、随着古籍的整理而日益丰富。诸子的成书、西汉的献书令、宋、明的类书编纂、各个时期的注疏等古籍整理工作,使上古史日益丰富;三、非主流学者的介入。春秋时期贵族的没落、晋以后宗教的介入、唐以后科举导致的教育普及以及宋以后随着印刷术发展导致的私刻书籍盛行,都使有关上古史的资料得以增益。

(二) 学科发展规律的必然

学问如积薪,后来居上。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后世对于上古史的认识未必会比前代人差,这是学科积累的必然结果,中国上古史的日益完善也是如此。另外新资料、新方法的使用也会开辟前人所不能见的领域,加强对上古史的认识。

明显的例子就是上古史的系统化。整合与系统化是所有学科的必然方法,史学也不例外。从历代对上古史的认识,可以明显看到上古史的系统化过程。《论语》中有五帝时代的记载:

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论语·泰伯》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这里给出了一个自唐虞到周代的古史系统,但尧、舜、禹与夏、商、周只表现出相继性,尚未被合为一个系统。到《墨子》时代,从尧舜至周代的古史已经开始系统化了:

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墨子·尚贤中》

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墨子·尚贤中》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墨子·节葬下》

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墨子·天志中》

《墨子》已经把尧到周的时期合称为三代,尧、舜也笼统地归于夏代。到《韩非子》时代,则出现了更系统的划分,古史时代也扩展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子·五蠹》

上古竞于道德,中出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五蠹》

这一时期,对上古史的分期与扩展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出现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划分。即便以行文恣肆著称的《庄子》也有了类似的划分: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泉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

《庄子·内篇》

根据“德下衰”也把上古史分为三个时期。这种

系统化和扩展,当是对上古史认识前进的结果。

与对历史认识系统化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历史解释的系统化。人们力图根据历史总结规律,为社会变化找到合理的解释。如西周时只需要对几次政权转移进行解释,所以有“天命”与“德”就足够了。而到春秋、战国之后,人们不仅要“天命”,而且要对小国被灭和大国争锋做出解释,所以“五行”政治理论出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利用当世的理论观察和描述上古的事情,将上古的史事纳入一个新的系统,同时也力求从上古史事中寻找支持当代理论的素材。

在研究上古史中,我们应该区分两个概念,即史实与古史系统。个体的史实是古史系统的素材,古史系统是史实的综合。古史系统和理论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会采取已有的史实,而不是伪造,以“三皇”、“五帝”为例,《左传》、《国语》、《易传》、《五帝德》等各有说法,这只是整理者不同的综合方法所致,而不全是伪造的结果。许多研究者拘泥于“三”与“五”的组合与意义,断为晚出与伪造,未必准确。其实“三皇”、“五帝”本身就是后世的一种总结与排比,而不可能是当时既有的名称。虽然“三皇”、“五帝”之称后出,但是就其中的每个人而言,未必都是后世伪造出来的。“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中,“伪造”的主要是系统,而不是古史。所以,貌似“伪”的古史系统中包含有许多真实的史实。

上古史的丰富与系统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学者对于上古史认识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完全出于伪造。史学自身的完善和学科的发展都使上古史越来越丰满,于是“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就出现了。

对于这种“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对待。首先我们要了解层累造成的内因,了解文献传承过程中的增益、整合、系统化、转述、翻译与个性化,也要肯定前代学者应有的严谨与审慎,不能因为晚出表现出“层累”特点就简单否定。

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史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伪造”部分,记录方式的落后、时代的混淆、各类材料的混杂、加上整理者为迎合时势的需要以及史识的不一,使得古史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靠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古史辩派的学者们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树立了可效法的榜样,“疑古”的旗帜和精神必然将继续下去。

我一直不同意将古史辩派称为“疑古派”,因为“疑古”只是手段,破坏只是过程,而古史辩派的目的

的却在于建立可信的中国古史,如顾颉刚先生言“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我很想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能够有新的建设”^①。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古代的史实,构建一个合理的古史系统,可以说是其他学者和古史辨派学者共同的目的。

文献中的中国古史并非完全伪造,三皇五帝时代也有其合理的依据,我们尝试对这一时期做简要的分析。

二. 文化英雄时代——三皇时代

我们可以把文献记载中的黄帝以前的古史时代称为三皇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记载,文献虽然简单,但尚算多见。

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证明,这种帝王世系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存在,如上博简《容成氏》篇:“容成氏……尊卢氏、郝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木韦氏、圉氏之有天下也,皆皆不授其子而授贤。”

另外文献中还有:

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

《左传·昭公十八年》

豕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勘环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

《庄子·大宗师》

言黄帝、尧、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

《庄子·至乐》

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荀子·正论》

文、武之道同伏羲。

《荀子·成相》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

《吕氏春秋·古乐》

昔葛天氏之乐。

《吕氏春秋·古乐》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虞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史记·封禅书》

上上圣人:太昊帝宓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帝喾高辛氏、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上中仁人:女媧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沌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阻阴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悉诸、少典、列山氏、归氏、方雷氏、纂祖、彭鱼氏。

《汉书·古今人表》

文献中关于这些先王事业功绩的记录也很多,但无论出于何种著作,无论出现于何种年代,内容都整齐划一地具有共同的特点——圣王都是因为技术发明或文化创造有功于民而“王天下”的。如: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离。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系辞传下》

(神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易·系辞传下》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管子·形势篇》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管子·形势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

《韩非子·五蠹》

《庄子》、《尸子》等其他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文化英雄时代。古代英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的英雄,即文化英雄,一种是争夺英雄,即战争英雄。从中国历史初期看,主要是文化英雄,到后来,武功英雄才出现。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文治色彩,这与西方英雄时代的以战争英雄为主,强调英勇与征服有明显的不同。

文化英雄时代虽然久远,但这一阶段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后来的战争英雄时代,也依然有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如黄帝,在战争英雄之外,还同时兼具文化英雄的资格。后世的制度也是如此,如《国语·鲁语》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带有强烈的尊崇文化英雄的色彩。

炎帝时代当是文化英雄时代末期,而黄帝时代则进入战争英雄时期。

三. 最初的冲突期——同类生产方式的冲突

关于黄帝时代战争,文献有记载: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赦,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逸周书·尝麦解》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黑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史记·五帝本纪》

从相关记载看出,黄帝时代的主要战争有两次,一次是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战争,一次是炎黄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也就是说,炎帝、黄帝本为同一氏族,而现代考古学也倾向于把炎帝、黄帝同作为源起于陕西一带的氏族。而蚩尤则是东方的部族。

黄帝时代发生战争的原因主要是同类生产方式部族对资源的争夺。最早的农业文明出现于河谷与山间盆地,当农业技术发展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向平原地区迁移,大河两岸成为新来人群的争夺点。黄帝时代,来自西方的炎帝、黄帝和来自东方的蚩尤都来到了今冀北地区。当时族群体迁移的另一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自然灾害。从《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的记载看,黄帝时代很可能发生了旱涝灾害,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居地,三个部族先后进入了冀北平原,并发生了土地与资源的争夺。先是来自西方的炎帝、黄帝两支部族发生战争,而后炎帝、黄帝联合对抗来自东方的蚩尤部族。在这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中,炎帝、黄帝部族取得胜利。

蚩尤部族失败并退出冀北,是战争的结果,但并不一定完全是炎、黄部落力量强大所致,很可能还有生产方式的原因。从山东地区考古资料看,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址,即人们有了防御和战争行为,所以积累了较多军事知识,也形成了较强的军事力量,《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

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并非虚语。但是东方部族比炎黄部族多了一条退路——水稻种植,龙山时期山东地区已经出现水稻种植,东方部族可以适应南方的土地水利和气候资源。所以东方部族可以在南方寻找到极好的发展地域,具有更多的退路和余地,而不必要为居留在冀州东部地区付出长期战争的高昂代价。

蚩尤部族的迁移路线,大约是先向北到达冀北,当受到炎黄部落阻击后,退回到山东地区。而后分为两支,一支沿东部平原南迁,到达江苏、浙江等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为淮夷等诸夷;一支向西到达河南中部,然后向南经过南阳盆地,进入江汉、洞庭湖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三苗。苗人奉蚩尤为祖,应该与这批南迁者有关。

由于处于早期的民族交融期,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大交流少,所以冲突较多,黄帝时代的战争大约持续了一段时间,据称黄帝“五十二战,天下咸服”。但黄帝时代的战争是同类生产方式的部族对同类资源的争夺,主要是土地和资源的归属不确定导致各部族对新的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引起的,一旦新部族磨合,肥美的土地有了归属,人们就失去了战争的理由。土地和资源并不紧张,人们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生活下去。所以,炎黄时期虽然发生了战争,但没有催生国家出现——战争只是资源之争,具有临事而战的特点,而不是职业的政府和军队的有目的有预谋的行动。

而黄帝时代的群体整合和技术传播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大量技术发明被归功于黄帝,使黄帝带有强烈的文化英雄色彩,同时也使黄帝被后世追认为共祖。

在传统的史学系统中,历史记载起始于黄帝。这是由于自黄帝时代起,中国文明开始进入战争英雄时期。战争与社会动荡,一方面刺激各集团寻找致胜的制度和科技,给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带来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记忆和记录的重点。

四、中间融合期——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

黄帝时代之后,虽然依然冲突发生,但大规模的部族战争较少,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逸周书·尝麦解》称黄帝之后“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融合。炎黄部落取得胜利后,炎黄部落在华北平原不断壮大,又以此为基点,向四方渗透。炎黄部族主要向北达到今北京地区,向东进入山东地区,向南到达近江汉地区。而原居东方的蚩尤部族则部分向

南迁移,进入江淮地区,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混融期。

这一时期一方面继承和继续了文化英雄时期的许多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战争英雄时期的影响,表现文治与武功的双重性,但文治色彩更浓厚。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颡项时代和帝喾时代,人们在意识观念和族群融合方面得了巨大的进展。

颡项和帝喾时代的相关记载,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类是关于各族共祖的。

颡项时代在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是宗教改革:

颡项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

《国语·楚语》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自颡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

颡项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小儿。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

帝喾文献中出现次数很少,但帝俊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王国维先生认为帝喾即帝俊,使帝喾的形象一下子丰富起来。帝喾时代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时期,人们在对自然的解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大的进展。文献有: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西经》

这些记载当是对天文历法的解释,十日与十二日是中国传统纪日方式,即这一时期开始建立起较统一的历法。文献还有:

帝俊生禺号虎,禺号虎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山海经·大荒西经》

可以看出,“古代重大的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自农业(播百谷、作耕)、工业(始作下民百巧)、交通工具(为车)、文艺(始为琴瑟、始为歌

舞)。”

宗教改革、较统一计时方式的出现、技术起源与发展,一方面是事实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对自然现象、人类制度和技术起源的社会学解释,即在颡项、帝喾时代,各族群在文化技术前进的同时,还有过较广泛的解释学发展和传播,取得了较大的认同。

这一时期在群体的融合与认同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文献记载:

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项,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项,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国语·鲁语》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颡项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颡项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礼记·祭法》

这里颡项是有虞氏和夏后氏的共祖,而喾为商、周人的共祖。这应该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族群融合过程中追认的结果。

更主要的族际融合大约是在帝喾时代形成的,《大戴礼记·帝系》载:“(帝喾)上妃,有郤氏之女也,曰姜嫄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隰訾氏,产帝挚。”

帝喾成为唐、商、周的共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是虽然商、周人皆认为自己出于帝喾,但都不将帝喾作为是自己的始祖。而是另有始祖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所疑惑的也正是这一问题。很可能,帝喾是一种政治组合需要而虚拟的祖先。也就是说,帝喾之所以被追认为共祖,当与他的时代里各族的认同与融合取得巨大进步有关,而这种认同与融合的影响,则是在后来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帝喾成为各族的共祖。

这些共祖神的出现,说明社会处于一个族间的整合期,其时的民族融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追认共祖成为有效的认同方式。

所有这些关于颡项与帝喾的记载,就具体事件而言未必都是真实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先是自然、生产现象的解释与认同,然后是族群关系的解释与认同,符合民族融合的一般规律。所以,从总体而言,这些记录都是远古史实的史影。

这一时期的认同虽然效果明显,但是冲突依然存在,尤其是与同类型部族争夺生存资源的冲突。文献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淮南子·天文训》

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

《淮南子·兵略训》

(共工)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断嗣绝祀。

《淮南子·原道训》

共工氏作乱,帝尝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史记·楚世家》

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与共工的战争,很可能是中原地区为争夺水利资源而发生的冲突。

但与意识和群体的认同相比,战争处于次要的地位,融合与交流依然是主要方面。这种融合与交流以及间或的战争,使各族关系日益密切,社会组织形式也日益严密。

中国之所以没有明显的英雄时代,是因为中国在文化英雄时代影响深远,很早就建立了较广阔范围的群体认同,奠定了后世和合思想为主的一统思想,而不必然经过英雄时代的征服与统一。

五. 第二次冲突期——异类生产方式冲突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这一时期主要指尧、舜、禹时代。

尧、舜时期,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融合,内部达到了较好的认同。虽然内部冲突不曾根绝,但社会融合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粟作农业区,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等差别不大,在社会组织方式上,也实现了各群体之间的联盟。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需要更严密的组织维护秩序。为了适应族群融合,加强社会管理,相关的组织机构也建立起来,已经具有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冲突已经从同类生产方式部族之间的资源之争转变为不同生产方式部族之间的文化之争,主要表现为北方粟作文化与南方稻作文化的争端。所以,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北方内部的道德和教化,一方面是北方与南方的冲突与怀柔。这些在文献中都有反应,关于尧、舜文治的记载很多: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离娄上》

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荀子·议兵》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荀子·解蔽》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

《郢店楚简·唐虞之道》

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

《墨子·天志中》

关于尧、舜时期战争的记载也很多:

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尧兴而诛之。

《国语·楚语下》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吕氏春秋·恃君览》

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

《帝王世纪》

(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

《淮南子·修务训》

尧战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

《淮南子·兵略训》

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荀子·成相》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墨子·非攻》

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舜西教乎七戎,道死……

《墨子·节葬下》

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

《帝王世系》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吕氏春秋·上德》

干戈不用,三苗服。

《荀子·赋篇》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韩非子·五蠹》。

这类战争已经表示出明显的针对边远地区族群的文化骄傲和信仰传播的色彩,说明中原地区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获取了优势。

尧、舜、禹时期社会组织已经高度发达,但最终促成国家产生的动因则是治水。尧、舜、禹时代处于大洪水时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孟子·滕文公上》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尚书·尧典》

在禹之前,共工、鯀都曾承担治水的任务,但由于方法不当,没有成功。禹吸取了共工、鯀失败的教训,采取疏导的方式治水。疏导河流不仅工程量巨大,而且需要对广大流域内进行综合规划和治理,需要广大地域内的氏族共同行动。禹治水的范围很大:

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

九川, 陂鄣九泽, 丰殖九藪, 汨越九原, 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国语·周语》

禹疏九河, 濬济、漯而注诸海; 决汝、汉, 排淮、泗而注之江。 《孟子·滕文公上》

范围几乎遍及中国北方东部地区, 参与的部族也很多: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殷本纪》

维秦之先, 伯翳佐禹 《史记·周本纪》

伯益佐禹治水, 封于梁。 《汉书·五行志》

伯益佐禹有功, 封其子若水于徐, 后以为氏。 《路史》

太公望吕尚者, 东海人, 其先祖尝为四岳,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史记·齐太公世家》

共工氏从孙伯夷, 佐尧掌四岳, 佐禹治水, 封为吕侯, 为吕姓之始。 《吕氏世系表》

徐旭生先生认为除了南方的苗蛮部族外, 中国东方的华夏、东夷各部族都参加了治水。为了统筹规划共同行动, 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 国家逐渐形成。

有学者对古代的洪水和治水表示怀疑, 认为当时的洪水只是黄河中、下游主要局限兖州, 也不可能文献所载的工程规模。但从文献看, 水灾贯穿于尧、舜、禹三代, 应当是一次时间长规模大的洪水。更重要的是, 尧、舜的地域皆在晋南或豫西, 但治水的主要区域却及于黄河与淮河流域。所以当时洪水应是影响到了整个部落联盟的问题, 范围不会很小, 否则居于晋南地区的部族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治水。至于大禹治水的规模, 许多学者拘泥于技术问题, 认为没有金属工具, 开凿和疏通水道很难。其实, 古人决不是真的愚公移山。很多技术, 可能是新工具出现而被遗忘了, 如“束水攻沙”, 以疏浚壅塞, 如“火烧水泼”, 以粉碎岩石等, 都是可以利用自然原理而不利用金属工具即可做到的。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 一是部族融合程度较高, 大范围内的部族统一管理机构开始建成; 二是中原地区同质文化集团对周边异质文化集团的战争发生, 促使中原地区加速融合并调整管理方式; 三是为了适应治水需要, 各部族更加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这一切都要求建立更加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 促进了国家的产生和形成。

这一时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 许多的政治原则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 这一时期也成为后世政治效法的榜样。

六. 小 结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发展的演进次序是相符合的, 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系统性。如果文献皆是伪造, 那么伪造者必须要具有系统的历史知识和系统的伪造群体, 而这些显然是各个时代的作者们不能做到的。所以,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并非真的皆是伪造而成。

中国文献所载的“三皇五帝”时代, 基本经历了文化英雄时代、冲突期、融合期三个时段, 最终进入国家文明时代。文明英雄时代的色彩影响了各个时期, 使中国文明带有强烈的文治特点。

国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对更严密组织的形式的需求导致的。所有的社会变化, 无论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 还是宗教发展、王权加强和战争的发生, 只要是对社会组织的严密性提出更高要求, 就会对国家的产生直到促进作用。各个国家的环境、历史不同, 促使国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尽相同, 世界历史和国家起源表现出多样性, 并无固定的模式。

注释: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古史辨》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杜预注: “大庭氏, 古国名, 在鲁城内, 鲁於其处作库。”孔颖达疏: “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 一曰大庭氏。”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三联书店, 1997年。

、 、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观堂集林》卷九, 中华书局, 1959年。

《诗经·商颂·玄鸟》。

《诗经·大雅·长发》。

(责任编辑: 渊慧)